



温州研究集刊

SONG SHU PINGZHUAN

陈镇波 著

宋 恕 评传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宋恕评传

陈镇波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恕评传/陈镇波著.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 - 7 - 213 - 04221 - 8

I. ①宋… II. ①陈… III. ①宋恕(1862 ~
1910)—评传 IV. ①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8585 号

- | | |
|------|--|
| 书 名 | 宋恕评传 |
| 作 者 | 陈镇波 著 |
| 出版发行 |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 (0571)85061682 85176516 |
| 责任编辑 | 陈 雨 |
| 责任校对 | 张谷年 朱 妍 |
| 封面设计 | 厉 玲 |
| 电脑制版 |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1230 毫米 1/32 |
| 印 张 | 11.875 |
| 字 数 | 30 万 |
| 插 页 | 2 |
| 版 次 | 201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 - 7 - 213 - 04221 - 8 |
| 定 价 | 29.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千古变局”	(1)
封闭的清王朝被迫打开门户	(1)
“变局”和“强敌”	(9)
时代呼唤着人才	(11)
第二章 “当时意气浩无涯”	(15)
风雨燕归来	(15)
荒村寂寂高轩过	(20)
欲立非常业,纵目古今书	(24)
初出家门,受业大师	(28)
求志社和瑞平友人	(37)
半园小主人的“家难”	(45)
第三章 “燕生,奇才也”	(53)
“年来颇思觅灵药”	(53)
“人间何处有黄鹤?”	(66)
“风尘志事竟如何?”	(86)
“择古今之善,持中西之平”的《六斋卑议》	(100)

“寄食冷局，空蝗梁黍”	(120)
第四章 “赤县衰如此”，“何道援溺论？”	(143)
《津谈》——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	(143)
“道直甘蒙党李讥”	(165)
“多士几人忧赤县？”	(174)
维新运动中的散兵	(190)
“一夕严霜压五都”	(222)
“满地荆榛孰敢芳”	(230)
第五章 “晚退时代”	(248)
“萧萧家国千行泪”	(249)
“三岛日方丽，九州云正愁”	(277)
温州三杰和国学大师	(305)
“山左陈言三载余”	(326)
“绝世奇才，一梦不起”	(348)
附 录 刘绍宽《厚庄日记》戊戌年有关宋恕材料	(372)

第一章

“千古变局”

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宋恕(1862—1910)的生活时代,正是大清帝国日趋衰落、腐朽,走上灭亡的时代,而中国社会也正从封建社会一步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段时间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都发展到空前尖锐、空前激烈的程度。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的艰难曲折斗争中,既遭受了种种屈辱和苦难,但也上演了一场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剧,构成了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璀璨的页册。

在探求富强之路的先进中国人中,平阳的宋恕,便是杰出的代表之一。近代史专家熊月之认为,宋恕“是中国近代一位很有影响、十分值得研究的进步思想家”^[1]。

封闭的清王朝被迫打开门户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和随后签订的第一个丧权辱国条约——《南京条约》,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开始,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深远的影响当时尚很少被人了解。“五口通商”,打破了闭关锁国的老框框,但数千年来所形成的思想观念文化惰性却很难在西方的“船坚炮利”下轻易地改变过来。士大夫中仍守着北宋石介所概括的老观念,“天处于上,地处于下,居于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

内外,所以限也”。^[2]他们分不清曾侵占台湾的荷兰和炮轰虎门的英吉利,统呼之为“红毛番”;把明末侵占澳门的葡萄牙和屠杀吕宋华侨的西班牙都叫作“佛朗机”。乾隆年间修的《清朝文献通考》,根本不承认世界有五大洲之说,认为其“语涉诞状”。清初耶稣会士南怀仁著有《坤舆图说》,但作为通儒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认为该书是模仿我国古代方士的《神异经》,因而全部予以否定,“疑其东来以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这种对世界的无知,即使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初刊于1842年,五十卷,1847年增补为六十卷,第三次增订为一百卷)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初版于1848年,1866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重印此书,于次年列为京师同文馆教科书)等,这些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著作次第出版后,仍没有多少改变。宋恕曾感慨地指出,当时“士大夫之陋遂为自有文史以来所无。乃至主试督学者或未知胜朝(即明朝)之姓,参枢持节者多未披禹域之图,至乃云:‘朝鲜纯女无男’,‘日本界穿胸国’,‘四川最为近海’,‘洪泽之水通天’,‘八股即是五伦’,‘孔子出身一甲’……此种奇谬,以恕所亲见闻其语者,记之已几得千条。当先生(孙锵鸣)掌龙门书院(1887年)时,通国议论蔽固之度,以较唐宋盖数千万倍,较明盖数百倍,虽较乾隆以前殆亦数十倍”。^[3]

即使是维新思想的先驱、杰出爱国政治家林则徐(1785—1850)和讲求“经世致用”的爱国学者魏源(1794—1857),他们也摆脱不了愚昧的阴影。如林则徐认为“中国只要闭关绝市,便能置英国于死地”,国内“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哗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外国所必须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要需,何难闭关绝市!”^[4]这与乾隆五十八年(1793)给英王的敕文:“天朝无所不有,原不需外洋货物以通

有无。特因天朝产茶叶瓷器,是西洋各国及俄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内容又有什么两样?魏源的《海国图志》,激励国人发愤图强,总结经验,学习西方,抵抗侵略,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名言,但其中也不乏虚妄的记载。如对天主教传教的记叙:“受教者先令吞丸一枚,归则毁祖先神主,一心奉教,至死不移。有泄其术者,服下药,见厕中有物蠕动,洗视之,则女形寸许,眉目如生,诘之本师,曰:此乃天主圣母也”;“凡人教人病将死,必报其师。师至,则妻子皆踞室外,不许入,良久气绝则教师以白布囊死人之首,不许解视,盖目睛已被取去矣。有伪入教者,欲试其术,乃佯病数日不食,报其师至,果持小刀进前,将取睛,其人奋击之,乃跟踪遁。闻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纹银八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这种天方夜谭,时人却信以为真,这和1870年天津教案悲剧中,关于洋教堂“迷拐幼孩、挖眼剖心”,以此制长生药的传言,不是一脉相承吗?

1856—1860年,英、法利用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的时机在美俄的支持下,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侵略者认为“教训中国人”,“除去用强硬手段以外,好像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声称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同中华帝国的关系”。1861年,恭亲王奕訢在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的支持下,与那拉氏发动了“辛酉政变”,实行“垂帘听政”,从此那拉氏爬上了统治人民的“宝座”,开始了长达47年的反动统治。普鲁斯得意洋洋地说:“有效地帮助这一派人掌权,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因为“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如果我们注意到宋恕的一生,差不多是在那拉氏统治下度过的,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终形成,也离不开以那拉氏为首的罪恶统治这一大环境,这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 and 评估宋恕等启蒙思想家和维新改革派

的历史意义。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北京被侵略者蹂躏，圆明园这座举世无双的园林杰作、中外罕见的艺术宝库被劫掠焚毁，大片的领土被侵吞，神圣的主权遭践踏，但在封建统治者的心中，人民起义始终是“心腹之害”，而俄、英的侵略不过是“肘腋之忧”、“肢体之患”。侵略者也认为除非给清政府以“强有力的援助”，否则“这座房子就会坍下来，而我们最好的利益也就此埋入废墟”。这样，中外反动派开始互相勾结，共同镇压革命，压制中国人民。被宋恕称为“经济知己”的李鸿章也就由此开始煊赫于清末政坛，成为一个在历史上争议纷纷的人物。

为了造成东西线夹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之势，也因为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之地：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5]，曾国藩让李鸿章招募淮勇，组建援沪之师。同治元年（1862）三月，即宋恕诞生时，李鸿章的淮军在英国洋行轮船的承运下，分批鼓轮西下，至五月中旬，十三营淮军全部抵沪。李鸿章在三月底奉命署理江苏巡抚，过了七个月，又由署理改为实授，而且署理通商大臣。在曾国藩的“积年训植，随事裁成”下，他迅速成了手握重兵、身兼巡抚和通商大臣的江苏实权人物，“以此隆隆直上”，几与“恩师”曾国藩“双峰对峙”。李鸿章到上海后，一面大力扩军，到同治三年（1864），已有“水陆七万人”；一面“讲求洋器”，积极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和机器生产，以图“自强”。他说：“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6]在镇压太平天国同时，也含有抵御外辱的意图。他不惜重资购买洋枪洋炮，并命令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炸炮、洋枪之法，但主张“莫专靠洋人做生活”，认为“总要我军能自收自放，然后出而攻战，可无敌于天下”。^[7]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清廷指示各省督抚，“飭令中国员弁学习洋人制造各项火器之术，务须得其密传，能利攻剿，以为自强之计”。第二年起，李鸿章即遵旨聘请洋人，先后创设“炸弹三局”，即英助理军医马格里

主持的苏州洋炮局,韩殿甲、丁日昌分别主持的上海洋炮局。三局月产炸弹一万多个。

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起义失败。李鸿章在战争和与洋人打交道中,开始向西方学习,从而把洋务的“自强”活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在同治三年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中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宝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他抨击顽固守旧势力说:“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名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8]奕訢赞同李鸿章的建议,肯定“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现在即应“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便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这在当时可说是一个进步。同治四年,由丁日昌负责,李鸿章将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炮局和购得的设在虹口的美商旗昌铁厂合并,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的综合性新式军用企业。同年,他升署两江总督,乃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改称金陵机器局。此后逐渐扩充规模,改良设备,到19世纪60年代末,已能制造多种口径的大炮、炮弹、枪子和各种军用品。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以奕訢、桂良、文祥等为首,于1861年奏准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主要任务是办理外交,同时还经管通商、海防、军务、关税等,后来发展到总揽整个“洋务”事宜,俨然成为清“帝国

政府的内阁”。在总理衙门之下，分设南、北洋通商大臣。同治十二年（1873）后，南洋大臣例由两江总督兼任；同治九年（1870），北洋通商大臣加“钦差”名义，由直隶总督兼任，管理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山东三省通商、交涉事务，兼督海防和办理其他洋务。北洋大臣虽列于总理衙门之下，却无直接隶属关系，只是所办事项按例皆由总理衙门承转。李鸿章自同治九年（1870）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达 25 年之久，他专办清政府外交，兴办北洋海陆军，并在北方和长江流域继续筹办轮船、电报、煤、铁、纺织等企业，北洋大臣的地位不断提高，职权范围不断扩大，势力凌驾于南洋大臣之上，成为当时最大的洋务运动实力派。总署设立的第二年，为了培养翻译人员，恭亲王奕訢奏设京师同文馆，隶属总理衙门。同文馆先设英、法、俄文三班，聘请外国教习，招收十三四岁左右的八旗子弟，虽相当于小学程度，却是中国近代化学校的先声。后添设天文算学馆，学习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并提高入学条件，招收 30 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吏入学，厚给薪水，住馆学习。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奏请清政府批准，仿京师同文馆例，在上海成立广方言馆，招收 14 岁以下文童入馆；次年，广州也设立广方言馆，招收 14—20 岁之间的满汉学生，也收 20 岁以上的有科举功名的学员。

军火工业的举办，总署和同文馆的设立，这些封建专制母体中极微小的变化，却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剧烈反对。当时的知识分子领袖之一、知名学者李慈铭（1830—1894）就认为总理衙门之设是“非理，宜以理藩院（清代管理少数民族事务之机构）并辖，而添设侍郎一人，以恭邸总理之，不宜别立司署，尝为一二当事者言之而不听也。及考选六部内阁属官为司员，又窃谓士稍自好者当不屑之，而一时郎吏奔走营求，唯恐弗得，则已大骇。有为之者未尝不力止，止而不可，则未尝齿及之矣。然大僚之与此事者，固一二

唯阿寡廉鲜耻之人也”。^[9]他阻挡不了总署的设立,只好骂在其中工作的人是“唯阿寡廉鲜耻”,表现了不屑齿及的态度。及至提高同文馆招生条件,顽固派以大学士倭仁(1804—1871)为首,就公开出来反对了。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云:“同文馆之开始也,朝议拟选阁部翰林官年少聪颖者肄业馆中。时倭文端以正学自任,力言其不可。御史张盛藻遂奏称:天文算法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成工部督匠役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疏上,都下一时传诵,以为至论。虽未邀谕允,而词馆曹郎,皆自以下乔迁谷为耻,竟无一人肯入馆者。朝廷岁糜巨款,止养成三数通译才耳。当时士大夫见解如是,宜乎,郭筠仙(嵩焘)、丁雨生(日昌)皆以汉奸见摈于清议也。”^[10]作为顽固派主帅,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在于礼义之心,不在一技一艺之长,现在既要学习技艺,又“奉夷为师”,这是“上亏国体,下失人心”。这场争论,倭仁虽然最后失败,但这一搅扰,使同文馆竟招不到学生。奕訢说:“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至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11]李慈铭也大为倭仁抱不平,在日记中发了一通议论:“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而又群焉趋之。盖学术不明,礼义尽丧,士习卑污,遂至于此。驯将夷夏不别,人道沦胥,家国之忧,非可言究,朝廷老成凋谢,仅存倭公,然谋钝势孤,无能匡正,而尚见嫉于执政,齟齬于宫廷”,被“困之”、“辱之”,对倭仁深表同情。这种保守的“至论”,还可以在翁同龢的日记中得到旁证:“同文馆之设,谣言甚多,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京师口语藉藉,或粘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或作对联: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学习西方一些皮毛科技知识、引进一些新鲜事物却掀起了轩然大波,这就是宋恕降生不久的全国政治大环境。

中国古代固然常有敌国外患,但主要来自西北、东北一带,而且经济文化发展都比较落后,从历史上看,先后都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鸦片战争以后就不同了,敌人主要从海洋而来,海防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重于塞防。他们挟资本主义这一当时先进的文明制度,直叩中国大门,“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不列颠和美国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12]。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借师助剿”、联合西方侵略者绞杀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也给了封建统治者深刻的印象。如李鸿章初到上海不久,就表示对洋人的枪炮十分佩服。他说:“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对洋枪洋炮的效用,曾国藩开始还不十分相信。李鸿章竭力说服他的老师。他说,外国兵少而强,中国兵多而弱,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枪炮窳滥”。他说,俄、日本来很弱,就因为“从前不知炮法”;自从“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雄长”。所以“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13]李鸿章等便是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开展洋务运动的。但这些观点并没有被当时的知识界普遍接受,正统的士大夫仍抱着历史的老观念不放,认为“中国之道,如洪炉鼓铸,万物都归一冶,若五胡、若元魏、若辽金、若金元,今皆与吾不可分辨也。他时(洋人)终必如此”^[14]。即使像俞樾这样的大学者,面对西方,仍祭着祖宗的老法宝,以为不必“舍旧谋新”,只要“返其本”,即“省刑罚,薄赋敛,使士者皆欲仕于朝,耕者皆欲耕于野;商贾皆日出于其途,邻国之民皆仰之如父母,如此者,在孟子时不过朝秦楚、益中国,在今日则虽统大九州而为之君,不难矣”。^[15]编撰《柔远新书》的朱克敬更是大声疾呼,反对向西方学习,“近日学西方者,多糟粕程朱,糝糠孔孟,赞美夷人,以为事事胜中国,用夷变夏即可自强,此大误也。……今我方舍旧谋新,而彼乃广购经史,教其国人诵习,我专学彼之短,彼

尽得我之长，则强弱之势愈悬，猾夏之祸愈烈，不数十年，衣冠礼义之邦，将成为兽蹄鸟迹之区，此鄙人所大惧也”。这种“药方只贩古时丹”的议论愈喧嚣尘上，则中国独立自强，向近代化迈进的阻力愈大。所以郭嵩焘立足世界，正确地指出这些认识的偏颇：“三代盛时，圣人政教所及，中土一隅而已，湖南、江浙，皆蛮夷也。……是所谓戎狄者，但据礼乐政教所及言之，其不服中国礼乐政教，而以寇钞为事，谓之夷狄，为其倏盛倏衰，环起以立国者，宜以中国为宗也。非谓尽地球纵横七万里，皆为夷狄，独中土一隅不问其政教风俗何若，可以凌驾而出其上也。”^[16]旁观者清，马克思就曾忧虑地评论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17]。

“变局”和“强敌”

对鸦片战争后“时势”的认识，最早的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扬州的一个秀才黄钧宰，他在《金壶七墨》中毫不含糊地写道，西方人的到来是一大“变局”。但曲高和寡，中国仍在酣睡之中，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变局”的认识才在部分务实的、讲求“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中逐渐形成共识。据统计，在19世纪下半叶提出“变局”论的不下60余人，其中王韬、薛福成、郑观应三人提到“变局”论之处，都在十次以上。^[18]首先是王韬，于同治三年（1864）代友人黄胜《上苏抚李宫保书》中说：“当今风气大开，远方毕至，海舶估艘，羽集鳞萃，欧洲诸邦，几于国有其人，商居其利，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19]王韬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反对顽固派的深闭固拒、因噎废食，主张化害为利，抓住机遇：“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

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奇智之士”。但他“握利权”、“树国威”、与西方进行商品竞争的清醒建议，并没有被李鸿章所采纳，后来他离开香港、出游欧洲了。李鸿章可能接受了王韬对时势的估计，第二年在致函朱九香时说：“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者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鄙人一发狂言，为世诟病所不敢避”^[20]。随着同治十一年（1872）制造轮船之争和十三年塞防海防之议，李鸿章对时势的特点认识逐渐深化了。他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又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因为各国列强挟着资本主义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对形势虽有清醒的认识，并提出了“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方针，希望在和平的环境中“借法自强”。但西方列强步步进逼，不断蚕食，不会让我们安然自强，而他的“变法”也没有完全脱离儒家治平传统，不过是“欲求驭外之术，惟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21]在封建统治日益腐朽，他自己权势日隆，且与慈禧勾结日深的情况下，虽也有“变法度必先易官制”的思想，却从不敢形诸章奏，只是与友朋私下谈谈而已，具体的办法仍是洋务的“求强”和“求富”。

时代呼唤着人才

“千古变局”呼唤着新的人才。这种新人要能解放思想,破汉宋旧学藩篱,清算三千余年中国文化,分辨“国粹”和“国糠”,“粹之界说,以有益于其社会者为断;糠之界说,以有损于其社会者为断”^[22]。从而探求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没有迈向现代化的深层文化根源。这种新人,要勇于对外开放,广迎西学,有着博大的胸怀。邓小平说:“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23]。从林则徐、魏源一直到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在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他们都在不同程度的开放改革道路上,为中国的富强而奋斗。这种新人,在探索改革的道路上,要不怕挫折,前仆后继,不惧误解,勇往直前。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曾把学习西方、推行变法分为四个阶段。即鸦片战争以后的二十年,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林则徐创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同治初到中法战争的二十年,曾、左、李等,“渐知西人之长,创制造局以制器译书,设方言馆,创招商局,派出洋学生”,“变法之事,于是肇路开山矣”;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的十年,“识者渐知西法之不可尽拒,谈洋务者亦不以为深耻”,但所学西法,仍“不过称其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而已,所采用者,不过器械军兵而已,无人知有学者,更无人知有政者”;甲午战争失败后,由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天下人士咸知变法,风气大开矣”。^[24]梁氏的概括并不完全正确。中法战争前,王韬、薛福成、马

建忠等已在一定程度上主张学习西方世界的一切,反对顽固的封建保守派,热烈地鼓吹变法自强,并且丰富和扩大了变法的内容,溢出了洋务派的一些范围。中法战争后,清政府的造船制炮等洋务活动不断遭受失败,何启、郑观应、陈虬、陈炽和薛、王等,认识逐步提高,表现出批判洋务派的倾向,“重商”和“君民共主”成为19世纪80年代先进知识界政治思潮的重要特色,成为戊戌维新运动的直接先驱。但到了世纪之交,甲午战争的惨败,中国面临“精华已竭,膏血俱尽,坐而垂毙”(康有为语)的严重局面,正处在“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孙中山语)的危急状态,才出现戊戌维新运动的高潮。但远不是“朝野上下”甚至“天下”咸知这种危机,变法图强经不起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一击,“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康、梁远遁海外,寄希望于君主立宪以救中国,“此路不通”。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在八国联军侵略之下完全屈膝,竟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这时,时代呼唤的是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的新人。

宋恕仅活了半个世纪,但这是中国历史上“千古变局”的时代,是血和泪交织的时代。“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在整个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25]反映在学术思想上,则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侵袭,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竭虑、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26]。对宋恕一生和他的贡献与不足,我们将尽可能在这一总的时代历史背